

■青春岁月

永不消逝的电波

□于德深 文/图

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冬夜，我正在灯下复习功课，从晶体管的收音机里传来电波的声音，夏青正用他那宽厚洪亮的声音播送征兵消息。我心动了，跟妈妈说，我报名当兵吧。妈没有作声，而爸爸开了腔：“当什么兵，你才几岁？”

爸是我们的一家之主，脾气特暴。我知道说多少话都是多余的，那一夜我没有合眼，只想着到部队去，尽一个青年的义务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偷偷地咬破手指写下了“我要当兵”的血书带到了征兵的地方。部队首长被感动了，虽然我那时只有16岁，还是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学生，却被特批入了伍！

到部队的第七天，我便同其他三位新兵被叫到团部，一个参谋告诉我们：你们四人现在就坐火车去师部，学习无线电技术。在50多年前提到“无线电”这三个字，对大多数人来说既神秘又陌生，我只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，能学得了这个专业吗？坐在南下的火车上，那几位战友有说有笑。我坐在一旁，看着前方飞

驰的电线杆和一排排稍纵即逝的白杨树发呆……

师部离城里很近，看到那宽广的马路、耸起的楼房、闪亮的霓虹，从乡下第一次走出来的我心里亮堂了许多，既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个学习机会而高兴，又为自己会不会被淘汰而捏一把汗。集训开始了！我们这个报务集训队共有二十几人，队长赵连荣是位河南兵，他在全军装甲兵无线电比赛中曾荣获过第二名，是位名副其实的尖子。或许正是因为他出类拔萃和我的求知若渴，他对我特别关爱。闲暇时常常约我出去遛弯儿，告诉我发报的要领，从一点一画、一个字母、一句通讯用语教起。领导的关心让我体会到了解放军这所大学的温暖，也激励了我学习的斗志。为了练好在强干扰下的收发报技术，我特意在广播期间、噪音大的情况下练，使收报技术提高很快。在战友们睡觉的时候、在同志们午休的时间，我都把自己关在教室里坚持着敲打电键。练得手指起了血泡，血泡破了淌着脓血、针扎一样疼，最后



变成了老茧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终于练就了一手好的发报技术，在全队20多人中名列第一。而好几位战友因为掌握要领欠妥，中间不得不接受被淘汰的命运。

直到今天，我转业到地方很多年，仍然对自己在部队的专业情有独钟，闲暇时偶尔拿起订书器当电键敲打几下；听到收音机里电波的声音，也情不自禁跟着用手在大腿上划拉着。我想如果有一天祖国需要我的时候，我这个老兵依然可以拿起手中的电键，履行我保卫祖国疆土的职责！

军旅，曾经是我的生命。而那“嘀嘀嗒嗒”的声音，是我心中永不消逝的电波。



父母的爱情

□张红军 文/图

1965年9月8日，高中毕业后的父亲花了5分钱将户口过到新疆，从家乡坐火车到吐鲁番，又从吐鲁番坐了4天4夜的解放牌大卡车，终于到达新疆阿克苏阿瓦提丰收三场，成为家乡第一批“支援新疆建设知识青年”的一分子。当年的解放牌大卡车上分4排坐着32个知识青年，命运将一个大眼睛姑娘安排到了父亲的对面，“我们面对面坐着”，故事就这样开始了。

父亲和母亲正式恋爱是5年之后的1970年，恋爱的方式是两人共同养了一条叫“呆子”的狗。那时父亲在农场里放羊，属于“半自由”职业者，而母亲所住的“地窝子”刚好在河的对岸。每次母亲到河边洗衣服，父亲就在这边看着。农场里一度闹“阶级斗争”，父亲被列为批斗对象，大嫂们都来劝母亲：“那个‘地主羔子’有什么好的，我们给你介绍一个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。”母亲只是一笑，她把“悄

悄话”写成小纸条，洗衣服的时候埋在身后地下，而每次父亲都能准确无误地找到，从无失手。父亲母亲把这解释为“心有灵犀”。那段时间两个人不方便见面，每天只能这样隔河望着。倒是“呆子”根据现实重新制定了作息时间表，它每天晚上守在父亲的地窝子门前睡觉，早晨准时到河对岸的母亲那里报到，母亲走到哪它就跟到哪，母亲上工了，它就坐在地头静静地看着她，直到黄昏日暮，活像父亲的“小卧底”。

父亲和母亲的这场恋爱一共谈了8年。8年间父亲自学成才，练出一手好木匠活。当时知识青年都睡简易的木棍拼床，父亲刻苦钻研，做了一张镶有黑色人造革靠背的高低木板床，乐颠颠地扛到河东。这使母亲成为农场第一个睡上木板床的姑娘，也是让她至今还感到无比自豪的事情。

1978年，父亲和母亲回老家探亲并结为夫妻。二人回到农场，分到一间半土砖房，在此安了小家。1979年我出生，同年出现第一例知识青年返城的情况。1984年，距离第一次到新疆整整20年，父亲母亲双双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。

从新疆离开的时候，父亲和母亲把所有家具什物变卖，唯有那张单人床，左看右看不舍得扔，干脆一起运回老家，作为他们爱情的见证，直到今天还保留着。

■家庭相册

父亲的谎言

□佟雨航 文/图

一天傍晚，母亲遛弯归来，手里提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塑料袋。母亲神秘兮兮地说：“这可是好东西，能治疗好些疑难病呢……”

原来，母亲在遛弯时，看到街边的一个摊子前围了一大群人，便好奇地挤了进去，只见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倾情讲述：“我妈就是吃了这个叫人参果的药材熬煮的水，才治好了折磨她30多年的老哮喘病……”说完，那名妇女买了200多元钱的“人参果”喜滋滋地走了。见此情景，周围的人都纷纷掏出钱来买“人参果”，母亲也把兜里仅有的200元钱掏了出来，因为母亲就是一个哮喘病患者。

没等母亲讲完，我依据自己的人生经验，大声嚷嚷起来：“我的傻妈妈呀，你上当受骗了！那个中年妇女就是个‘托儿’，她和卖药材的人是一伙的！你也不想想，就凭这个灰头土脸、跟带壳花生没什么两样的所谓人参果，就能治愈哮喘顽疾？简直就是天方夜谭！”听我这么一说，母亲的兴奋劲儿一下子没有了，她也感觉到自己的确有些冲动，一丝悔意瞬间写在了母亲的脸上。母亲是个非常节俭的人，她心疼自己好不容易挣来的钱白白打了水漂儿。

这时，一直站在旁边沉默不语的父亲开腔说道：“素娥，别听航航胡说，他懂得什么？”我



十分不解地瞅着父亲。父亲走南闯北见多识广，怎么连这点小伎俩也分辨不出来呢？父亲没理睬我，走向母亲，仔细看了看母亲买的药材，惊喜地说：“没错，就是这种药材，俗称‘人参果’。我奶奶当年就是喝了它熬煮的水治好了老腿腿疼病，但就是不知道对你的哮喘病管不管用。”

父亲接过母亲手里的药材说：“我这就去给你熬煮上，早喝早好。”我悄悄地随着父亲进了厨房，问父亲：“爸，难道你就看不出来那些就是骗人的假药材吗？你真要让我妈喝这来历不明的药材水啊？”父亲说：“我怎么会看出来呢？我用些别的药材代替它们煮水。”我问：“那你为什么不明白白地告诉我妈却还要说谎瞒着她呢？”父亲淡淡地说：“你妈平时多节俭，也是有病乱投医，已经上了一次当了，她心里不好受，就别再刺激她了……”

我不禁佩服起父亲的体贴入微。母亲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每年都要住几次医院，家里经济也不宽裕，这又被骗200元钱，还不得窝囊出病来？到底父亲与母亲一起生活了几十年，他最懂母亲。父亲的谎言里，也藏着对母亲细致入微的爱。

■图片故事



婚宴变奏曲

□闫孔喜 文/图

记忆里我家的三次婚宴，像激昂的变奏曲，热闹始终，旋律不同。

三叔娶亲是在1970年4月，那天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正好开口唱起《东方红》。村邻直夸三叔的婚日喜庆，可我们小孩子却只记得婚宴的饭菜好吃。

为了备办三叔的婚宴，奶奶早就淘晒了小麦，组织家人推磨碾面。爷爷挥动镢头劈木柴，父亲则让我帮他搓细红麻绳子，给三叔编织婚床上铺的箔子。这些还都只是婚前的工作。三叔的喜日如期登陆在线，爷爷请来厨子，然后族中大人向庄里东家借碗、西家借竹筷和酒盅子，小孩们则帮助找桌子、搬板凳，婚宴终于在千呼万唤中闪亮登场。那年月婚宴最有看点的是堂屋里坐的大宴席。那里气氛严肃，宾主



举止彬彬，桌上摆着婚宴的最高规格：八大碗菜，光肉片子就有五碗。油晃晃、金灿灿的“碗头”（即大块的油炸肉）特别诱人涎水。席间，宾客们都想吃一块“碗头”，可大家都互相让着，谁也不愿第一个下筷子。散席后，宾客每人都分得两个带红点的好面蒸馍和两块“碗头”带回家去，各家的孩子早就伸长了脖子翘首期待大人们不舍得吃下的美食。那年我8岁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结婚了。娶的虽是干部家的千金，可婚礼却在农村举行，婚宴设在老家的简陋平房里。那时父亲已把户主“禅让”给了我，我对婚宴进行了大胆改革，蒸馍让红点子退居二线，粗陋的大碗下了岗，酒盅换成玻璃盏。厨子尚需请，桌子板凳还得外借。制作婚宴的灶锅也不像三叔结婚时那样局促在厨房里，而是按照父亲的开放政策，把锅灶“开放”到门外的场地上。婚宴的档次提高了20个百分点：四个凉菜，十二盘热菜，外加荤素两盆汤。

去年我儿子结婚，婚宴依然设在老家。楼前水泥地敞而亮，婚宴的桌数是一道复杂的算术题：三叔婚宴和我婚宴桌数总和的2倍。儿子的婚日宾客虽多，场面虽大，可我的家人和族众却都很清闲，因为婚宴的一切全有“包桌社”承包了。这样的婚宴模式已在农村实验了数年，正能量看涨。“包桌社”的两辆“中卡”拉来了儿子的婚宴用具：一切皆大团圆，圆桌子、圆凳子，圆盘子、圆汤盆、圆蒸屉、圆炒锅，通红的炉火被鼓风机吹得溜溜圆。婚宴被“包桌社”老板安排得井井有条，服务生平托托盘穿梭于婚宴间，规矩大方，板眼分明。整场婚宴像一部电视连续剧，节奏明快、有张有弛，无需东家操心。

再看我，一个上午只愿想着别人的吃喝，自己的肚子瘪得贴后心，也不曾进一口水，客人散去，我才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……